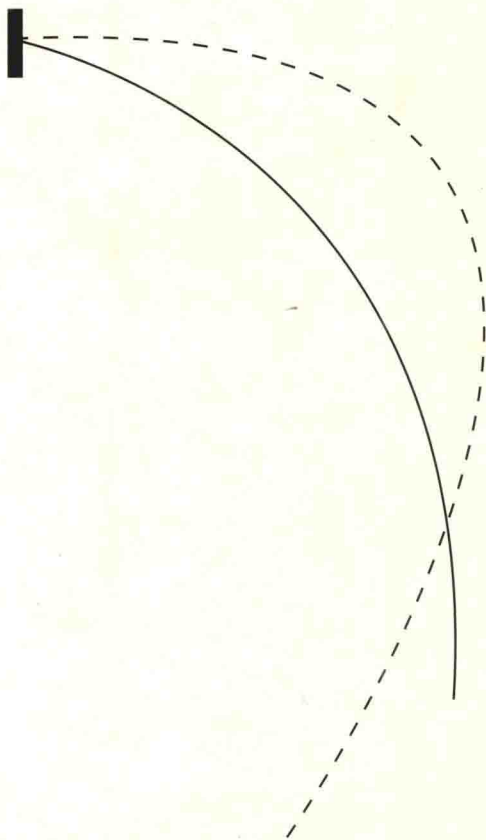




Xuexiao Da Bianlun



学校大辩论

——20世纪80年代美国公共教育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冲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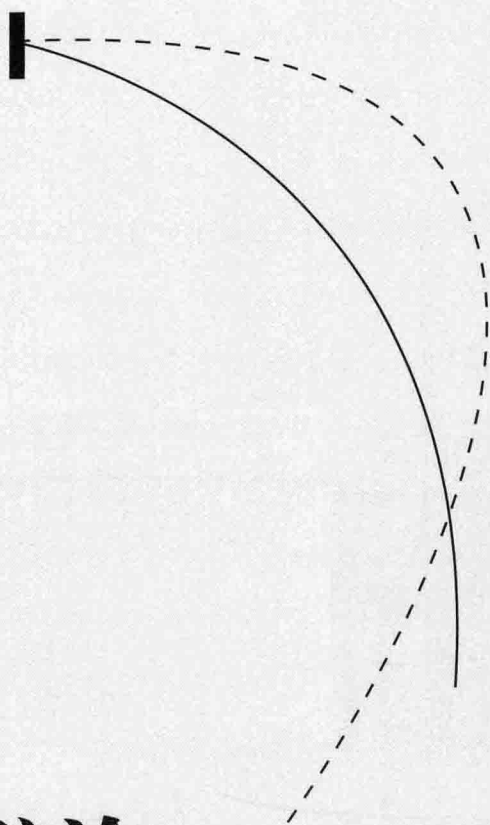
露茜/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Xuexiao Da Bianlun



学校大辩论

——20世纪80年代美国公共教育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冲突

陈露茜/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 北 京 ·

出版人 所广一
策划编辑 李 东
责任编辑 李 芳
版式设计 孙欢欢
责任校对 贾静芳
责任印制 曲凤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校大辩论: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公共教育政策中的
意识形态冲突 / 陈露茜著.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4. 1

(教育博士文库)

ISBN 978 - 7 - 5041 - 8163 - 3

I. ①学… II. ①陈… III. ①教育政策—研究—美国
—现代 IV. ①G57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09121 号

教育博士文库

学校大辩论——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公共教育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冲突

XUEXIAO DA BIANLUN——20SHIJI 80NIANDAI MEIGUO GONGGONG JIAOYU ZHENGCE
ZHONG DE YISHI XINGTAI CHONGTU

出版发行	教育科学出版社	市场部电话	010 - 64989009
社 址	北京·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甲 9 号	编辑部电话	010 - 64989235
邮 编	100101	网 址	http://www.esph.com.cn
传 真	010 - 64891796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制 作	北京金奥都图文制作中心		
印 刷	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69 毫米 × 239 毫米 16 开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张	13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97 千	定 价	3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陈露茜，女，1981年生，福建福州人，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资料《高等教育》编辑，研究方向为教育政策分析、外国教育史。2004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世界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学位；200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外国教育史专业，获教育学硕士学位；2010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外国教育史专业，获教育学博士学位。先后赴韩国国立釜山大学、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交流访学。目前，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青年课题“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校大辩论’研究”；主持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校大辩论’中主流象征的政治性与工具性分析”；主持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决策咨询及预研委托项目预研及委托）项目“当代

美国保守主义公共教育政策的符号研究”；先后在《教育研究》、《教育学报》、《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比较教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教育科学研究》等学术期刊上发表数十篇学术论文，并有多篇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政治学》等全文转载；独立或主持翻译《美国教育史：一场伟大的美国实验》、《美国公共教育：关于美国教育史的研究和阐释》、《阶级、科层制与学校：美国教育变革之幻影》等多本著作；参与《西方教育思想史》、《外国教育史》、《20世纪教育学名著导读》、《教育学名著导读》等多本教材的编写工作。

《教育博士文库》学术委员会

主 任：顾明远

副主任：徐长发

委 员：（按姓氏笔画）

汪永铨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理事长
北京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顾明远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徐长发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 研究员

董 奇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裴娣娜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摘 要

本书采用象征政治理论来分析“学校大辩论”，进而呈现、解释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公共教育政策文本背后的权力关系问题，它涉及谁拥有权力和如何表达权力两个方面。

经研究，本书认为，在“学校大辩论”中，新保守主义与传统派对“优异”“选择”这两大“主流象征”的生产和再阐释的过程，彰显的是美国新保守主义与传统派对整体社会价值控制权的争夺，其目的是实现保守主义阵营在精神世界与世俗社会统治的合法化。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保守主义在美国的全面复兴与现代化，拥有美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主导权的新保守主义与传统派在制造了国家“危机”、社会“危机”与公共教育“危机”的社会历史背景中，生产出“优异”与“选择”两大公共教育政策的“主流象征”，并试图通过这两大“主流象征”来表达新保守主义与传统派在价值观和“常识”领域的控制权力。在“优异”与“选择”这两大“主流象征”的“生产”过程中，新保守主义与传统派之间在“常识”领域出现了意识形态冲突与斗争，在实践层面达成了媾和与妥协，最终创立并强化了一套由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主导的教育关系乃至整体社会关系的交往模式，这不仅赋予美国公共教育以全新的品性——“常识”领域的集权与“制度”领域的放权相结合，再次证明了美国公共教育的内在结构性冲突，而且保障了保守主义在全社会权力统治结构的合法化。

因此，在“学校大辩论”中，象征着美国公共教育政策的“优异”与“选择”从未真正被实施过，“优异”与“选择”是由新保守主义与传统派精心筛选、苦心经营的公共教育政策的“主流象征”，它们必然承载

II

着新保守主义与传统派要求其承载的新保守主义与传统派的目标与价值观，彰显着新保守主义与传统派的官僚控制力、专业控制力、政治控制力、市场控制力以及最核心、最根本的价值控制力，试图掩盖新保守主义与传统派所拥有的不平等的权力与控制的利益，并最终实现新保守主义与传统派统治权力的合法化。

关键词 “学校大辩论” 公共教育政策 意识形态 保守主义

The Great School Debates

—The Ideological Conflicts of the Modern American Public Educational Policy in the 1980s

ABSTRACT

Assisted by the symbolic politic theory, this dissertation tried to analyze the Great School Debates in the 1980s, and further, tried to interpret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powers standed behind American public educational policy in the 1980s, which concerned two perspectives, who had the power and how to express the power.

This dissertation found out that, in the Great School Debates, the production and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two “dominant symbols” by the neoconservatives and the traditionalists, expressed the fights between the neoconservatives and the traditionalists for the control of social values.

In the 1980s, as long as the Conservative Restoration and Modernization, the neoconservatives and the traditionalists, who had the dominant powers over the society, the politics, the economic, and the culture, fabricated the national “crisis”, the social “crisis” and the public educational “crisis”, produced the two “dominant symbols”, “excellence” and “choice”, in public educational policy, and tried to use these two “symbols” to express the control over values and “common senses”. In this process, the neoconservatives and the traditionalists had the ideological conflicts in the field of “common sense”, but got the compromise in the practical level. It is that which not only endowed the new characters to American public education, or the combination of the centrali-

IV

zation of “common sense” and the decentralization of “institute”, and proved again the inner structural conflicts of American public education, but also guaranteed the legitimization of the Conservative’s govern over the whole society.

Key Words: The Great School Debates, Public Educational Policy, Ideology, Conservatism

序

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社会关于公共教育的“学校大辩论”是当代美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重大事件。它既是“二战”后美国历次教育改革和论争的延续、聚焦和升华，又深刻地影响了近30年美国公共教育的政策走向。关于这场辩论，陈露茜博士的《学校大辩论——20世纪80年代美国公共教育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冲突》已经进行了较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我没有更多的话要说。就我的阅读和了解而言，在国内教育学界，目前为止还没有对“学校大辩论”开展过像本书这样的研究。

在这篇序言中，我想重点说的是这本著作成书过程中的一些事情。

1998—1999年我在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做富布莱特研究学者时，曾数次听到几位美国学者在讲座或授课中提到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学校大辩论”。尽管他们对这场辩论的评价各异，但都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受此影响，当时我也曾购置和阅读了一些资料，对这场辩论有些印象。但因当时的学术兴趣主要在美国高等教育史，所以并未将这场辩论列入研究计划。回国后的近10年里，俗务缠身，更是无暇顾及。数年后，当与陈露茜讨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时，似乎是“鬼使神差”，我突然又想到了这场辩论，所以建议她把这场辩论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

因为当时我对这场辩论了解有限，以为仅仅是一个单一的事件，仅仅是美国教育界几乎注定是“七八年来一次”的教育政策辩论，没有意识到其中所包含的深刻的复杂性和由此产生的研究工作的难度和工作量。因此，当露茜在接触了部分资料之后，对研究本身面露难色时，我感到有些手足无措。那时，虽然指导博士研究生的时间不到十年，还缺乏足够的经验，但即使这有限的经验也足以使我明白不能轻易改变论文选题方向，否

则不仅会影响论文的进度，更主要的还会影响论文的质量。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鼓励她坚持下去，至少先把这个历史事件的全过程客观地梳理出来。由于当时国内教育学界对这场辩论的研究尚不系统、不完整，即使能做到这一点，也是很难得的。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露茜不仅义无反顾地坚持把这个难度较大的题做完，而且在掌握大量一手文献的基础上，独辟蹊径，选择“意识形态的竞争”这样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角度探讨学校大辩论，从而使这种探讨变得更为深入。不夸张地说，国内教育学界以后还可能有更多关于这场大辩论的研究，一些研究成果很有可能超越这部著作所达到的水平，但无论什么样的研究，都很难绕开这部著作。在国内教育学界系统研究学校大辩论的开始阶段，就有如此良好的开端，确实令人欣慰。我也衷心希望，在今后的岁月中，露茜能在已有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全面、深入地开展对学校大辩论的研究，尤其是将大辩论置于美国当代教育意识形态和教育政策变迁的历史过程中加以审视，从而产出更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为自己学生即将出版的著作作序，对当老师的来说，确实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这既是对数年辛勤劳动成果的检视，也是一种慰藉。因此，首先要祝贺露茜。也希望她能以此为开端，在今后的学术发展道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借这个机会，对向来精心扶持青年学者成长的教育科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谢意。

张斌贤

2014年1月30日于北京

目 录

序	(I)
---------	-------

前言	(1)
----------	-------

第一章 “政治景象”的构建	(31)
---------------------	--------

第一节 战后“国家危机”的出现	(31)
-----------------------	--------

第二节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自由主义社会运动的破产	(37)
---------------------------------	--------

第三节 20 世纪 80 年代保守主义的复兴	(46)
------------------------------	--------

第四节 “学校大辩论”的滥觞	(58)
----------------------	--------

第二章 为“优异”而战	(65)
-------------------	--------

第一节 进步主义导致了学校中的知识“危机”	(66)
-----------------------------	--------

第二节 什么知识最有价值?	(72)
---------------------	--------

第三节 “全国课程”在教育政策文本中的确立	(80)
-----------------------------	--------

第四节 反抗者的声音:“谁的知识最有价值?”	(88)
------------------------------	--------

第三章 为“选择”而战	(99)
-------------------	--------

第一节 “单一的最优制度”导致了学校中的效能“危机” ...	(102)
--------------------------------	---------

第二节 什么样的学校最有效能?	(107)
-----------------------	---------

第三节 “特许学校”在教育政策文本中的确立	(116)
-----------------------------	---------

第四节 反抗者的声音:“谁能选择?”	(121)
--------------------------	---------

II

第四章 意识形态、符号与控制	(131)
第一节 站在新保守主义和传统派背后的五类控制模式.....	(133)
第二节 意识形态冲突、符号认同与控制的实现.....	(144)
第三节 美国公共教育的新特性与内在结构性冲突.....	(150)
结语	(158)
参考文献	(176)
后记	(196)

前言

本书呈现并解释的是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教育政策文本背后的权力关系问题，它涉及谁拥有权力和如何表达权力这两个方面。^①

教育与权力的关系问题，不仅是教育政治学中的一个核心命题，而且也为教育史研究提供了一种解释历史的思路，是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新左派史家持有的一种解释历史的路径。知识与学校从来就不是价值中立的，它体现着社会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教育改革，从本质上说，就是意识形态冲突的体现，是阶级冲突的体现，是持有不同意识形态的社

① 对于“什么是权力”，西方学者众说纷纭，形成了以下几种不同的观点：“权力”作为个人或国家的追求目标；“权力”作为影响力（influences）的度量尺度，即资源的内容与多寡；“权力”作为政治斗争的结果（results）；“权力”作为一种主宰（domination）与被主宰关系的表述。马克斯·韦伯（Max Web）将权力定义为“一个人或一些人在某一社会活动中，甚至是在不顾其他参与这种行动的人进行抵抗的情况下实现自己意志的可能性”。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认为权力是“获得未来任何明显利益的当前手段”。而对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来说，权力是“预期效果的产生”。丹尼斯·朗（Dennis H. Wrong）认为，“权力是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效果的能力”。以上几种对权力的解释虽然着眼点不同，但都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权力”的特性，即：权力是一种广泛存在着的力量，借助这种力量可以或可能产生某种特定的预期局面和结果。因此，在本文中，“权力”是特定优势意识形态集团在实现集团既定目标的过程中对管理对象理念和行为的影响力与控制力。权力的达成，即控制的实现。

会阶级争夺学校控制权力、文化控制权力与社会控制权力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部美国公共教育史就是一部“学校战争史”（history of school war）（Ravitch, 2000b; Berube, 1994）^{xiii, 113}。它既不像克伯莱（Ellwood P. Cubberley）所描述的那样，是一幅“合众为一”（E Pluribus Unum）的公共教育理念凯歌前进的胜利图景（Cubberley, 1919）；也不像戴安娜·拉维奇（Diane Ravitch）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个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的进步派（the progressives）与传统派（the traditionalists）之间不断论争的“钟摆”（Ravitch, 1983）；而是充斥着利益集团的厮杀、意识形态的讨伐和制度实践的相互妥协的政治斗争（Spring, 2005; Paris, 1995），而且直到在这场公共学校战争还在继续着。

20 世纪 80 年代是保守主义实现全面复兴与现代化的时代。保守主义复兴的一个重要议程就是要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斗争，不仅要争夺经济的领导权，而且更要站在教育文化道德战线的最前沿。他们秉持的基本信念是：“如果一个团体想真正拥有统治地位，真的想重建一个新的社会结构，经济上的统治地位必须与‘政治、道德和文化上的统治地位’相关联”，“赢得了政权也必须同时赢得世俗社会”（Apple, 2000a）²¹⁻²³。公共学校是保守主义在全社会范围内斗争中最为成功的一个领域。它将自由市场与国家宏观调控的经济理论成功地引入人们对经验、道德、义务和常识的是非判断中，并与基要主义（fundamentalism）相结合，形成了一个保守主义阵营（Apple, 2000b）²³⁰。但这个保守主义阵营并不是一个稳固的联盟，在阵营内部充斥着不同意识形态的斗争与妥协。而发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一场关于公共教育改革的“学校大辩论”正体现了保守主义阵营内部的意识形态冲突。

一、研究问题与意义

1983 年，随着《国家处于危机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A Nation at Risk: The Imperative for Educational Reform*）的发表，在美国国内出现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关于公共教育改革的大辩论。在这场大辩论中，许多教育政策制定者和教育实践家们以“优异”（excellence）与“选择”（choice）为号角，主张在公共学校推行“核心知识”（core knowledge）与“共同文

化”(common culture), 实行“全国课程”(national curriculum)与“教师授权”(teacher empowerment), 鼓励进行“学券制”(voucher)和“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改革, 试图改变美国公共学校中学生的学业不精现象和“学校危机”。但是, 这些改革政策实行20多年之后, 公共学校中的“危机”并没有得到缓解(Apple, 2006; Bacharach, 1990; Murphy, 1990; Webb, 2006), 学业不精现象依然大面积地存在, 公共学校中事实上的种族隔离愈演愈烈, 社会大众对公共学校的不满情绪日益加强, 教育政策文本与教育社会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异促使我们开始反思这场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学校大辩论”: 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公共教育中的不平等能够被容纳和认同? 20世纪80年代以来, “字面上的”、“浪漫的”公共教育政策是否真正被实施过? 20世纪80年代美国公共教育政策文本中的“文字符号”又具有哪些政治性与工具性?

基于对这些根本性问题的思考, 本书要研究的问题是: 在“学校大辩论”中, 保守主义阵营利用哪些“主流象征”生产出了教育政策文本? 这些“主流象征”具有哪些政治性和工具性? “主流象征”的这种政治性与工具性又折射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公共教育改革中的哪些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斗争与妥协? 本文尝试使用象征政治理论(symbolic politics theory)的分析逻辑, 在20世纪80年代保守主义复兴的“政治景象”(political spectacles)中, 考察“学校大辩论”中提出的“优异”与“选择”两大文字载体背后的政治含义, 从而阐释“学校大辩论”诸多议题背后所掩盖的美国公共教育改革中的意识形态冲突。

“学校大辩论”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保守主义教育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奠定了基础, 因此, 研究“学校大辩论”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一, 有助于系统梳理当代美国教育改革中的基本问题, 进一步完善美国教育史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 美国的基础教育改革一直是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学校大辩论”作为美国20世纪80年代教育改革的先声, 为美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乃至今天的教育改革绘制了蓝图, 它集中反映了美国基础教育改革过程中遭遇到的基本矛盾和价值冲突。因此, 系统地研究“学校大辩论”有助于我们清晰地把握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基本脉络。

第二, 有助于解决当前国内关于美国20世纪80年代基础教育改革研